

新中国工会事业的开创者

李立三

田田

李立三是我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地方和中央担任工人运动领袖，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五卅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大革命失败后，他是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5名成员之一，参与领导指挥了南昌起义。1930年一度实际主持中央工作，其间犯下“立三路线”错误，但他勇于承认错误，继续为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劳动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现中国劳动关系学院）首任校长等职务。李立三不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作为新中国工会工作和劳动事业的开创者，对我国工会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和创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工会建设的“坦克车”

李立三1899年出生在湖南的一个秀才之家。当地的一位老秀才给他取名叫李凤生，小名狗妹子。上学后父亲给他改名叫李隆郢。1921年冬，李立三接受党的指派到安源搞工人运动。毛泽东认为他的名字难认又难写，建议他改名。他到安源后，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能至。在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为了便于工作，他又改过一次名，但常用名还是李隆郢。有一次与邓中夏在去上海途中，邓中夏提议他换一个简单的名字便于选举，刚好看到三个人立在火车门口，于是改名李立三。

李立三长期领导党的工人运动。1948年，李立三参与筹备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作。8月初，在哈尔滨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李立三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的陈云说，我是一辆木炭车做不了许多事，而李立三同志却是一辆坦克车，可以胜任主持全总的工会。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李立三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全总副主席兼党组书记，主持全总工作。这一时期，他以旺盛的精力和极大的热情，为新中国的工会建设作出了大量极富开创性的探索工作。他经常深入基层，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坚决反对“只重视机器不重视人”的错误思想。去厂矿进行调查研时，每到一地除了会去检查车间保险设施，李立三总是要重点检查两个地方：食堂和厕所。他会去工人的集体食堂和工人们一起吃顿饭，也会去工人厕所检查那里的卫生情况，确保工人们的待遇与健康。

新中国成立之初，李立三便开始对工会工作理论的勇敢探索，先后撰写《在公营企业中贯彻公私兼顾政策等问题的几点意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草案的几点说明》等，对新中国成立后工会工作面临的新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分析了公私关系、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日常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厘清了工会和国家企业行政在根本一致基础上的内部矛盾关系，探讨了工人参加工厂管理的重要途径等一系列工会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与此同时，李立三积极引导新中国工会实践工作，他主持起草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规定了单一会员制和团体会员制的入会程序，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规范了全总组织机构的性质和任务，使新中国工会的组织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道

路，极大地推动了工会组织的建设。李立三还花了很大心思抓工会立法工作。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成为我国工会建设的基本法典，为全国工人阶级更好地组织起来奠定了法制基础。此外，他主持制定了《工厂管理委员会条例》《职工代表大会条例》等几十项法规和条例，为工会的组织建设和保障工人群众的民主权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工人谋取长远的幸福”

在1940年向共产国际提交的《自述》中，李立三曾回忆了当年日本纱厂的工人所遭受的惨无人道的剥削，“日本工头及其他职员还经常动手打人，常有童工或孕妇被殴打致死的情况发生”。当1965年暑期，李立三再次南下来到上海时，他特意主动提出前往当年日本小沙渡纱厂，回忆起五卅运动他依旧情绪激昂，特别是讲到日本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榨时，他止不住内心的愤懑说：“工人受不了这样的非人待遇，纷纷起来抗议，一个日本工头居然开枪，当场打死了站在前面的顾正红同志。但小沙渡工厂的工人没有被这种暴行所吓倒，马上宣布罢工。两个小时之后，所有日本纱厂的工人也都随即罢工了。不久便爆发了波澜壮阔的五卅运动。”当到达原日本纱厂旧址，厂领导邀请李立三去休息室时，他却要求首先要去顾正红同志当年遇害的地方，并在纪念碑前深深鞠躬默哀。李立三作为我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者之一，始终关心关爱工人疾苦，在新中国劳动事业中“为工人谋取长远的幸福”成为他一生的坚持。

新中国成立后，李立三作为首任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部长，继续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1950年3月，他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局长会议，正确贯彻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城市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的方针，把动员和组织工人阶级搞好生产作为首要任务。为了及时地处理好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他把救济失业工人同组织他们从事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既避免了单纯救济造成国家过重的负担，又通过以工代赈为城市建设办了许多好事。针对当时劳资纠纷较频繁的情况，他参与制定了《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关于私营工商业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的暂行办法》等处理劳资关系的几个重要文件，把劳资关系纳入民主、平等、契约的互利轨道，实现了工人阶级领导政权下的“劳资两利”。李立三在劳动工作中始终心系广大工人阶级，以维护广大工人的政治权利和物质福利为最大己任，不仅初创了新中国劳动保护制度，更是下大力抓工人福利的立法工作，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劳动保护条例》《中共中央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等文件，大大改善了工人的劳动条件，为解决职工生、老、病、死、伤、残的实际困难而尽心尽力。

“任是霜凌不变心”

李立三生前最喜爱出自清代郑板桥之手、以竹子为主题的四幅水墨画，其中一幅中的翠竹尤其刚劲挺拔，傲视霜雪般猗猗而立，画上意味深长地题有两句诗：“直饶岁冷无凋叶，任是霜凌不变心。”成为李立三一生的拳拳之心与坚强党性的生动写照。正如党中央在《李立三同志的悼词》中的评价：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李立三一生中无论顺境逆境，始终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少年李立三在投笔从军前，曾写下《元旦试笔诗》：“浩气横牛斗，如焚痛国仇。诗书从此别，投笔效班超。”以表救国心志。在赴法国勤工俭学期间，李立三奋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崭新的思想武器，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救中国。通过创办《华工周报》向华工宣传马克思主义，李立三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成功地领导安源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组织上海五卅运动，成为工运领袖和全国总工会的领导者。

李立三坚持自我批评，勇于修正错误。革命战争时期，李立三就对自己过去所犯的“立三路线”错误作了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再次深刻检讨了自己历史上的错误。1949年9月，全总党组决定以华北职工干部学校为基础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第一年由李立三兼任校长。李立三除了在开学典礼上讲过话外，还专门作过一次形势报告。他在讲台上连续讲了3个小时，侃侃而谈。当讲到“立三路线”时，他毫不避短，反而以自嘲的口吻说：“什么是‘立三路线’？‘立三路线’就是撞到了南墙还不知回头，一直撞到头破血流……”台下的同学们对校长这种勇于承认错误的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十分钦佩，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党的八大上，他对自己历史上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又进行了一次总清算，树立了勇于自我批评、改正错误的表率。

□ 毛志华

1931年9月5日，我党早期杰出的革命家，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和卓越的军事指挥员李硕勋，在28岁的青春年华，英勇就义于海口东校场刑场，用自己满腔热血写下一个革命者永不泯灭的厚重人生。65年后，人们在烈士殉难处竖像建亭，并特意将亭前道路更名为“勋亭路”，以永怀先烈，训育后进。亭前竖立着花岗岩雕刻的李硕勋烈士半身塑像，正面镌刻邓小平题写的“李硕勋烈士永垂不朽”，基座刻有李硕勋烈士写给妻子赵君陶的绝笔信。全文如下：

陶：
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

勋九四

寥寥数语，李硕勋烈士从容就义、慷慨临刑的画面跃然而出，这泣血文字承载着他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忡忡忧心，对人民革命事业的拳拳追求，对爱妻爱子的深深眷恋，读之不禁潸然泪下，亦肃然起敬。

1903年2月23日，李硕勋出生在四川庆符县（今高县）一个清贫的商人家庭。他自幼禀赋聪慧，勤敏好学。先后在成都省立一中、上海大学学习，积极投入各项斗争。192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五卅运动这一反帝爱国斗争的推动者之一。北伐战争中，担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25师政治部主任的李硕勋率部在河南上蔡击败奉军，后回师武汉，东下讨蒋。1927年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被任命为第11军第25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30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江南省委（江苏、安徽、浙江和上海）军委书记。

1931年春，李硕勋奉命到粤赣边区担任红7军政委，因身患疾病，被迫留在香港治疗。其间李硕勋改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8月，

党史评价中的红四方面军

□ 姚金果

在短期内迅速发展。到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已有5个军、8万余人，川陕根据地总面积达42000平方公里、人口500余万，控制了8座县城，建立了23个县市革命政权。对于红四方面军的重大胜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给予高度评价：“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大区域，川陕苏区还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

长征时期。1935年1月22日，中央向红四方面军总部发电要求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遂发起陕南战役和嘉陵江战役，6月与中央和中央红军会师。两军会合后，张国焘先是同中央在北上还是南下问题上发生分歧，在北上途中又擅自率部南下，后又另立中央，犯了严重错误。9月1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有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但认为红四方面军还是可靠的，号召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从公开的历史看，中央对红四方面军评价的改变，即把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联系起来，是在1936年6月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电报中反映出来的。电报认为，红四方面军存在“军阀作风以及政治和军事战略上的机会主义

激励后人的不朽教材——李硕勋烈士纪念亭碑文敬读

他赴海南岛指导军事工作，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忠贞不屈，在写下碑文所刻“与妻书”后，壮烈牺牲！

李硕勋以赤子之心铸就钢铁城墙，以泰山之力撑起民族脊梁，他短暂而光荣的一生所表现的思想品德和精神风范，犹如一座灯塔，永远照耀我们在逐梦路上奋勇前行。

学习李硕勋烈士担当任事、鞠躬尽瘁的精神意志。李硕勋一生担任过很多职务。党调他一处他熟悉一地，调他一处他深入一处，始终躬亲尽责，无私无畏，千方百计把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从事学生运动，他为唤起同胞自强觉醒、引导青年投身反帝斗争积极奔走。军内任职，他因地制宜加强官兵思想政治教育，让25师这支曾沾染旧军阀习气的队伍脱胎换骨，成为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白区斗争，他机智果敢、镇定自若，数次挽救同志安危，让组织免遭重大损失。主持浙江省委日常工作，他忘我工作，迅速恢复20多个县的党组织。任职江苏省委军委书记，他以极大热情和胆量，发动和领导了苏北的农民起义，并先后筹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第十五军、第十七军。“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是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精神写照，更体现出他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九死无悔的坚强意志。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进入新时代，我们要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对工作任劳任怨、尽心竭力，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学习李硕勋烈士理想崇高、真挚浓烈的家国情怀。李硕勋是坚贞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不屈的革命者，更是一个有情人、有血有肉的人。当他的人生选择一次次与内心情感逆向而行，绝不是因为不善顾家园亲情，而在于这炽热的情怀早已从乡土走向家国。南昌起义前，他看望怀有身孕的妻子，因军情紧急，只能是匆匆一瞥；白区斗争，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他，每每出行都要特意让妻子给自己化装，只为减轻她的担忧；香港团聚，几天的天伦之乐竟成永远的诀别。在狱中，他将写好的“与妻书”捧读良久，斟酌下把“前线”改为“前方”，把“善视吾儿”改为“善育吾儿”。“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死后勿为我过悲”“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流淌着他对爱妻爱子的愧疚与不舍，更加坚定地表达出他为之追求真理的可贵，为之斗争理想的崇高，为之献身事业的伟大。精神有了归属，生命才有意义，家国情怀就是永不衰竭的精神涌流。只要我们把远大理想与个人抱负、家国情怀与人生追求融为一体，常怀爱民之心、常思兴国之道、常念复兴之志，必能描绘大写人生、成就非凡意义。



不屈的革命者，更是一个有情人、有血有肉的人。当他的人生选择一次次与内心情感逆向而行，绝不是因为不善顾家园亲情，而在于这炽热的情怀早已从乡土走向家国。南昌起义前，他看望怀有身孕的妻子，因军情紧急，只能是匆匆一瞥；白区斗争，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他，每每出行都要特意让妻子给自己化装，只为减轻她的担忧；香港团聚，几天的天伦之乐竟成永远的诀别。在狱中，他将写好的“与妻书”捧读良久，斟酌下把“前线”改为“前方”，把“善视吾儿”改为“善育吾儿”。“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死后勿为我过悲”“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流淌着他对爱妻爱子的愧疚与不舍，更加坚定地表达出他为之追求真理的可贵，为之斗争理想的崇高，为之献身事业的伟大。精神有了归属，生命才有意义，家国情怀就是永不衰竭的精神涌流。只要我们把远大理想与个人抱负、家国情怀与人生追求融为一体，常怀爱民之心、常思兴国之道、常念复兴之志，必能描绘大写人生、成就非凡意义。

四方面军历史的研究和宣传逐渐展开，对于红四方面军的评价也基本摆脱了此前的思维定式，不再与张国焘的错误捆绑在一起，而是回到历史的长河中重新定义。1991年，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对红四方面军作出了基本客观的评价：其一，肯定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斗争所积累的经验对“整个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二，明确红四方面军的西征是“根据中革军委员会”；其三，赞扬西路军表现了“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

20世纪90年代开始，党史研究领域对红四方面军历史的研究进一步深入，评价也进一步公正。2002年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在原有基础上对西路军的贡献作出进一步肯定：“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对甘肃省考察时深情地说：“我心里一直牵挂西路军历史和牺牲的将士，他们作出的重大的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贡献，永载史册。”对西路军作出了高度评价。